

~~05-04~~ 08.06

牡丹江工運史料

1

1

牡丹江市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

牡丹江工运史料

第一辑

(内部资料)

牡丹江市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

一九八三年五月

前　　言

《牡丹江工运史料》是牡丹江工人运动的历史研究资料书刊。每期将综合整理各个历史时期的有关档案文献、重要文件、报刊文摘、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访问记录、重要历史事件、厂史、店史等，专题调查、史料考证和探讨性文章。其中，有的档案资料，为保持原意，便于分析研究，对原文或引用文字未作更动。有的综合历史资料、革命回忆录等文章，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编者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在此基础上，借以取得有关领导和党史研究部门的指导与帮助，以及各地有关部门和各级工会的支持与协作；广泛地交流历史研究资料和经验，为编写《牡丹江工人运动史》积累更加翔实、准确和可信的历史资料。

牡丹江工人运动史是黑龙江工人运动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又是牡丹江党史和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做好收集、整理、研究和编纂牡丹江工人运动史稿，我们殷切希望各有关单位、各级工会给以协助，提供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史料和稿件，使有关历史档案和群众“口碑”的史实资料，更加准确和完整地充实工运史的内容，为史所用。从而振奋群众，激励后人，增强振兴中华，同于“四化”的信心和力量。

本辑系不定期的内部交流资料，只供研究参考。由于工作经验不足，资料收集不全，有些史料限于水平，未及整理，尚待多方核实，在编辑过程中会有一定缺点和错误，有待进一步查证，在陆续刊印时，加以订正。我们恳切地希望各级领导、各级工会和有关同志批评指正，并对已刊出的各种工运史料，提出修改或补充意见。

目 录

前 言

史 资 料 研 究

- 牡丹江手工业工人及其行帮的形成 (1)
牡丹江早期伐木工人斗争史料研究 (4)
牡丹江工人抗俄斗争史料考证 (9)

专 题 调 查

- 牡丹江铁路工人反抗日本侵略斗争史调查记 (20)

访 问 纪 实

- 访问地下党员段新民同志记录 (31)
访问中共吉东局职工部长吴福海同志记录 (33)

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职工部工运史料辑

- 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职工部简介 (34)
中东铁路职工部事件始末 (36)

- (人物传记) 赵采青同志传略 (43)
(人物传记) 王新文同志革命事迹 (54)
(人物传记) 戴吉山同志简历 (57)
(人物传记) 牡丹江工运人物名录 (一) (58)

回 忆 录

- 苏文革命回忆录 (节录) (59)
刘泰革命回忆录 (节选整理) (64)

牡丹江手工业工人及其行帮的形成

我国历史文献，大量记载着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古代民族聚居的地方。从唐代设置了行政统辖区，就已建立了通往中原的交通路。历代统治者为有效地对内施行统治，对外强化边防，都极为重视开辟和扩大足以保证军需畅通的交通线。早在元朝至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牡丹江也河（现牡丹江市兴隆区）就建立了从三姓至宁古塔的中间驿站。崇德八年（1643年），沙俄侵略军侵扰黑龙江，始增强了宁古塔的驻防八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始设置了连接边陲的重要驿站。这对传递文书，驰报军情，转运军需，保证反击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驿站设立后，首先是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进步。雍正年间（1725年前后），黑龙江境内的农垦面积达十余万垧。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内地进步生产技术陆续的传入，手工业作坊相继出现，开始产生了手工业雇工，从而形成了行帮。

手工作坊和手工业工人的出现

驿站的建立，对保卫边防，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初期是在驿站设立大量的站丁（发遣俘兵），他们除应役外，还以站为基地，就近开垦农田。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和商业网的形成，首先是生产工具已不再依赖内地贩运，便有了专门从事铁犁、铁耙、铁镐、铁锄、铁铲等生产工具和铁锅、铁钉等生产生活用品的铁匠炉相应地出现；仿

制内地风车、长柄葫芦（播种用）、柳罐、木叉、扬锨和舟车等木制品，以及石磨、石滚、石碾等手工业生产，有了显著的进步。

最初，手工业是酿酒和毛皮的熟制，从少数民族沿用黄米和牛马奶的家庭制酒到生产作坊和烧锅；用奶和盐熟皮到以硝熟制皮革；用手工制泥瓦生活用品等，逐渐提高了主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由于汉族进步技术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是站丁聚居各大站，而且汉族农民也冲破封禁地，大量进入了宁古塔各驿站，并建立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据点。

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的发展，奴隶性雇佣和商品性雇佣劳动力的扩大，铁匠、木匠、石匠、皮匠、弓匠、鞍匠、瓦匠、铜匠、纸匠，以及烧锅、酱园、粮栈、客栈、饭庄和小店铺等工匠、学徒相继增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贸易市场的扩大，汉族的封建文化和各种宗教的传入，寺庙也随之兴建起来。特别是关帝庙各地皆有，这对各行工匠、学徒工结成行帮活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手工业行会和行帮

乾隆年间，牡丹江屯河镇的人口已发展到两万人。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工人发展壮大，行会也应运而生。最初阶段，实际上只是一种重乡土观念的“同乡会”，它无分行业，没有主仆之别，而是依据各自的原籍形成的，如宁古塔的山东会馆、直隶会馆、山西会馆，即所称“山东帮”、“直隶帮”、“山西帮”等“帮会”。后来，各行业具备了独立发展的条件，中小户为摆脱大户的控制，又形成了以行业为区分的行会（行业会）。它除了把地理区域变成按经营性质划分，化大帮

为小帮（行业）以外，没有改变封建行会制度的帮会性质。直到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工人的迅速增多，行会内部的阶级分化趋于扩大，同时师徒关系的确立，各行手工业工匠、学徒为了争取改善待遇和进行互助活动，于是产生了本行业或跨行业的与雇主相对立的行帮，即“拜把子”形式的兄弟结社。

牡丹江乜河镇的关帝庙（乾隆四十年建），就成了伐木工人、手工业工人等雇佣劳动者结拜的香坛。一九〇〇年六月，在这座庙门前的环抱古树下，曾经聚集了筑路工人、建桥工人和部分手工业工人五百多名，在这里设拳坛。他们在反抗沙俄侵略的乜河保卫战和铁岭河反击战中，建立了卓著的历史功勋。

（宋文撰稿）

牡丹江早期伐木工人斗争史料研究

牡丹江伐木工人产生在清代中国封建经济渡过了漫长历史阶段，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新时期。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形成了从奴隶性雇佣过渡到商品属性雇佣的“伐木人”，随后出现了“行帮”。这一组织的形成，对维护雇工自身权利，进而发展到大规模地反帝爱国运动，对保卫边疆起到了积极作用。

伐木工人的产生和劳动境况

牡丹江是群山环抱的山峦之滨，遍地苍松丛林，素有“林海”之称。自古以来，我国东北少数民族世居森林，向以林产为部落，名某某窝集（即满语“老林”）。在宁古塔境内部落民，“薪不须买，门外即是”，城镇和部落都在每年冬季用爬犁行驶“软雪中运木”，把“一年之薪积于舍前”。而且生活习惯上以木为主，“房屋大小不等木料极大”，木造房屋比比皆是，甚之“以木为城池”。木制舟车农具与日用生活器具和取暖用薪炭，等等，无不大量消耗木材。因此，林业中雇工经营有了发展，便逐渐产生了专门从事砍伐、加工和搬运的林业工人。

“富者奴任之，贫者子若孙任之，或无子孙则雇倩人”。

与此同时，木材“间有买者”，作为商品的木材贸易市场和“雇倩人”的帮工雇佣劳动出现，农产品、狩猎物、木制品与农木原料的商品交换有了发展，也使奴隶性的雇工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得以进入雇佣劳动力市场。综观于此，可以看出

牡丹江伐木工人的产生是较早的，其发展的历史年代也是久远的。

“伐木为第一等劳苦”。史书对伐木人的艰苦生活，亦不讳言载册。特别是销运路程远及京城，又促成了砍伐规模的扩大，水旱两路的木筏和车船上雇工的增多。道光末年和咸丰初年（1850年）已渐形成很多“伐木通道”和“伐木站”通过水陆交通，不仅运销三姓、宽城（长春）、盛京（沈阳），而且还远销京津等地。而伐木工人的劳动条件却更加艰苦，生活处境不如牛马。因此，伐木工人汇同猎户和挖参人也在寻求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

伐木工人“行帮”的出现

“牡丹江水是人参水”。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宁古塔纪略》载俗称：“因上流来自深山大谷产人参之区，故有此说”。然而，上谷河流，却浸透了牡丹江伐木工人和挖参人的血汗。由于入山挖参要有山区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和防卫野兽袭击的能力，当地猎户、伐木人是独有的受雇或参与挖参的理想之人。加之挖参人与伐木者往往是狩猎户、农牧民的某种意义上又是自然联合体的劳动者。这些伐木挖参人和猎户，大都是夏季种田捕鱼，秋季采集山珍，冬季狩猎伐木，史籍称“打牧人”。特别是汉族采金挖参人的增多，汉族生产技术、文化和宗教等的传入，“沟民”和雇工的“结义”，对伐木工人的生产斗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结义兄弟，“拜把子”是入山必行之举。这就是牡丹江伐木工人的一种有组织形式活动的一个开端。

最初，伐木工、猎户和挖参雇工结拜入山是为了对付自然

界的侵袭，曾经受到封建雇主的赞许。但是，清政府却害怕人民，根本无视边远地方的边民发展农牧采集山珍对促进和巩固边疆的重要历史作用。反而加紧派驻清军不断镇压工人的反抗斗争，以维护封建统治及其残酷的剥削制度。这样，“行帮”出现，就逐渐演变成成为雇工向凶过豺狼的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的唯一组织形式。

雍正八年（1730年）以后的十余年间，宁古塔境内“聚数千人”，“冬狩猎，夏偷挖人参”，他们大多居住在山沟河谷，称为“沟民”。道光三十年，（1850年），“汉民居赫哲中，三姓东三千里散居挖参”。大小“沟民”部落组织严密，“有大哥之长，群听令焉”，其“条教严明，众不敢犯。”光绪十五年前后（1889年），牡丹江一带伐木工人和淘金工人发生较大规模的聚众起义，唐殿荣就是从伐木工、淘金工中产生和备受拥戴的群众首领。这支工人武装，发展成为后来抗俄斗争中的重要力量。

清政府镇压人民起义

乾隆十年（1745年），宁古塔督统借口无“龙票”（入山证明），开始镇压“偷挖人参犯”。同治三年（1864年），竟然使用“洋枪队”，对伐木者和挖参人残酷镇压，所谓“肃清匪患”。这一镇压措施，激起人民的更大反抗。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初十日，人民起义武装攻陷了宁古塔。“塔城失守”以后，“吉林洋枪队救塔城之急”的同时，于“七月十三日傍晚破城股匪从海浪河渡船……”。宁古塔一带的人民武装起义，震撼了盛京，惊动了边外。光绪初年（1880年），清政府内外交困，采取了媚俄政策和镇压行动。

各部落的人民起义武装受到了暂时的挫折，主力军退出了宁古塔。此后，光绪十五年左右（1889年），唐殿荣率领伐木工人和淘金工人配有枪械的武装，辗转在牡丹江一带继续进行反清活动。

伐木工人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沙俄铁路勘测队侵入牡丹江一带查勘路基。翌年，沙俄筑路工程队强行砍伐铁路沿线及其附近的森林，霸占我国森林资源。从牡丹江沿岸汇合大筏流下至伯力，把珍贵的红松日夜不停地运往俄国。不仅攫取我省所有森林的无限采伐权，而且大批俄商进入我省经营转卖。并在伐木林场建立制材厂、松脂油厂、火柴杆厂等，加工后高价转卖我国。甚至出现了“江省人民需用木材，均须请命于俄人”的怪现象。中国人入山伐木还得经过中东铁路发给“特别执照”，并且只准卖给铁路，不得自行外卖。沙俄侵略者每一年从全省大量掠夺的木材，据不完全统计达一亿银元以上。

沙俄勘测队到处乱闯，强占民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牡丹江两岸的郁郁丛山，夷为平地，大面积山林遭到沙俄的严重摧毁和洗劫。牡丹江伐木工人、淘金工人、手工业工人、猎户和农民目睹沙俄侵略者的种种罪恶活动，不断的奋起反抗。伐木工人头目唐殿荣组织抗俄武装上千人的义军，首先举起反抗沙俄侵略斗争旗帜，于一八九六年八月，把沙俄配备武装的勘测队赶出边界，拖长了修建工程的进度。直到一八九九年从哈尔滨至绥芬河的铁路干线还是处在“边拆边修”的局面。吉林将军长顺的奏折也不得不承认唐殿荣的义军，“与时出抢掠者不同。观其保护垦民，抗衡敌国，存心行事，侠义可

嘉，又非寻常盗匪所可同日而语”。在吉林将军长顺的诱降之下，虽然他对沙俄的侵略斗争是坚定的，但对清政府的“招抚”政策，却抱有很大幻想，终归为部下所弃。

牡丹江伐木工人在牡丹江工人反帝爱国运动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在抗俄斗争中涌现了象出身猎户、淘金工和伐木工人头目唐殿荣这样义军首领；在抗日斗争中也有象出身伐木工人的东北抗日救国军王德林这样的抗日民族英雄。

(宋文撰稿)



乜河关帝庙遗址
(1982年8月本室宋文摄)

一九〇〇年，牡丹江筑路工人聚集在这棵古树下设拳坛，树起了抗俄大旗。这座庙宇兴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是“正殿三楹禅堂三楹大门三楹”，具有民族风格的我国古代艺术建筑，它一向为工匠、学徒和过往伐木人、挖参人、采金工以及商客等的荟集之所。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八日，被沙俄侵略军洗劫乜河时全部焚毁。

这帧照片，正是庙门前一棵合抱古松的残断躯干和裸露地面上两块圆顶石座的大旗杆石拱基，虽已无法辨识其本来面目，庙宇毫无踪影，但仍不失为一个活的历史见证。

牡丹江工人抗俄斗争史料考证

乜河义和团运动和乜河保卫战

一九〇〇年，牡丹江乜河义和团运动是以筑路工人为主力军的抗俄武装。它是在以伐木工人为主体的反对沙俄占地筑路斗争的基础上，又掀起了新的反对沙俄侵略、保卫边疆的反帝爱国运动。

黑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资料：

《乜河抗俄斗争史调查记》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

1964年人文版第1期146页

“牡丹江边的著名古城宁古塔和乜河街也响起来‘一入庚子年，起了义和团，杀了洋教士，扒了电线杆’的歌谣。宁安义和团‘由城东菜园子姓张的山东人发起’在山神庙设立拳坛，有义和团员200多名。乜河义和团在关帝庙设坛，发展到五百多人”。

吉林将军长顺奏折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1900年7月25日)

“俄兵数千人攻我也河防营，突然开炮，继之以枪。我军列阵应敌，相持终日，互有伤亡，始各收队。次日，俄复间道包抄，攻塔防营回援，幸不为所袭。遂于塔城20余里外堵住，开仗半日，我军阵亡哨官二员、兵十余名，气颇沮。幸有拳民四十名突然而至，合兵攻击，俄始退扎”。 “于塔城四十里外坚筑高垒，

意在持久”。

多勃隆拉沃夫：《多勃隆拉沃夫满洲札记》
(1906年版)，第245页

“不得不从海参崴和双城子再调一个团的兵力进行增援。八月十九日由多勃隆拉沃夫上校率领在绥芬河车站附近，穿越国境，经穆棱河车站，徒步到达磨刀石，编入艾古斯托夫的部队”。

黑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资料：

《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乜河抗俄斗争史调查记》

“乜河战斗结束后，义和团英雄们又在铁岭河摆开了抗俄的战场。他们神出鬼没，到处打击沙俄侵略者。在坚持半个多月的战斗中，二百多名义和团战士和爱国士兵全部壮烈牺牲”。“宁古塔人民为了守卫塔城，和困城敌军相持达四十余日，使俄军久久不能得手”。

《讷河县志》第九卷

“二十八日，俄军又发起强大攻势，攻克了乜河防营，然后强渡牡丹江，冲垮了清军设在西岸的防线，向宁古塔发起总攻……。第二天，俄军又发起凌厉的攻势，破城而入，……”。义和团和爱国军民与优于自己数十倍的敌军“相持四十余日”，使俄军“伤亡重大”(瓦西里耶夫：《外贝尔加的哥萨克(史纲)》1916年版，第3卷第29页)。

唐殿荣等忠义军将领的抗俄斗争和 清政府的“招抚”

唐殿荣原籍山东，是牡丹江一带伐木工人的头目。一八九五年十月间，他目睹沙俄从绥芬河、三岔口(东宁)、穆棱侵入牡丹江边境一带的种种罪恶活动，奋起组织伐木工人、

淘金工人、猎户等抗俄武装上千人，反对沙俄勘测线路。一九〇〇年八月在宁古塔保卫战中，唐殿荣率部浴血奋战，英勇顽强，使俄军伤亡重大。一九〇一年一月，与刘永和、王和达所率领的抗俄义军，正式组成忠义军。但是，由于唐殿荣对清朝统治阶级抱有幻想，当他再次接受吉林将军长顺的“招抚”时，被反“招抚”的部下刺死。此后，忠义军继续坚持抗俄斗争和反清活动。

鲍·杰姆钦斯基：《俄国在满洲》
(彼得堡1905年版)

“一八九六年的整个夏天，一帮一帮的满洲土匪（红胡子），人数有时达三百人之多”，“数次越过边境进入俄国领土”。“这帮活动于夏季的满洲地方上的土匪，大大拖延了一八九六年考察队的工作，使这条将穿过满洲的铁路的勘测工作直到一八九七年才真正开始”。

长顺关于招抚唐殿荣、杨毓林
就地招募成营事宜的奏片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

“今唐殿荣与其伙杨毓林，虽系积年盗匪，但伏处山林，挖金度活，与时出抢掠者不同。观其保护垦民，抗衡敌国，存心行事，侠义可嘉，又非寻常盗匪所可同日而语。……若收抚唐殿荣，以盗攻盗，既可靖内患，以边氓防边，亦足固吾圉。合无仰恩天恩，俯准唐殿荣、杨毓林投诚之请，留营效力，以赎前愆。如蒙愈允，将来恳务一营，就地招募半多强梁之徒，即令唐殿荣管带，所有保护垦民，弹压匪类，以及清界搜山等事，俱为该营专责。仍责成节制之垦务局员，随时察看，傥仍有不循法度之事，立以军法治罪。……”

吉林将军为命令唐殿荣队伍在张广才岭设卡
御俄事给各属的札文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

“为札饬事：照得俄寇现已深入，自占踞额穆赫索罗后，又有暗袭大岭之意。唐殿荣队伍素称节制之师……。应将张广才岭重地、责成该管带会同本池团练，严密防守，不得稍形疏懈。”

吉林将军为称赞振东营循规安分虽败犹胜
给唐殿荣的札文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

“……塔城失守，各军奔逃，该营独殿其后。……塔城溃勇，四处抢掠，独振东营循规安分，此皆该营官平日训练所致，虽败犹胜也。”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宁古塔自六月下旬接仗，互有胜负，旋因围久不解，复添练捷胜三营，又调降勇唐殿荣所带之垦务营帮同堵御，并将其余丁五百余人另编成营，归降勇杨毓林管带，计自被围后，相持四十余日城陷，副都统双令带同各营退扎领穆赫索罗站。”

盛京将军增祺等奏“忠义军”等部屡与俄军
接仗情形折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1901年6月13日）

“……杨玉麟先经宁古塔垦局招抚，派为唐殿荣帮带。刘永和曾从事于珲春副都统英联营中，因亦自称统领，并名其军曰‘忠义’。自俄入吉，该等各率溃勇，辗转南下。”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1051页

“吉林将军长顺命令唐殿荣‘遣散外附’，……唐殿荣决定照办。……正在筹商缴械间，不料唐殿荣被不愿缴械的部下刺伤死去。随后杨毓麟被推为镇东军首领。”

吉林将军长顺给外务大臣的咨文